

于会泳(1920—1977)，山东人。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后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由于参与创作现代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等，被江青赏识。1975年任文化部部长。在任文化部长期间，充当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御用打手，压制、迫害进步、健康的艺术作品、艺术家。1976年10月被免去所担任的一切职务，后被审查逮捕。1977年9月服来苏水自杀。

被保存在档案袋里的字条

1946年9月，在老家已经当了5年小学教师的于会泳，约了两个伙伴，从家中偷跑了出来，整整步行了3天，赶到莱阳县的胶东文工团驻地，加入革命文艺队伍。

1947年9月，前敌指挥部决定，为了战略行动，每个团员都分到了一大包东西。

于会泳所在的那个小队决定，找个僻静干燥的地方，各人分头将自己的东西暂时埋藏起来。于会泳拿到这包东西，不禁想到了孤苦的母亲，就在即将把这包东西埋入坑内的时候，他拿出自己的一张照片写上了自己家的地址，又取出一张纸，按当时瓦解蒋军的标语口号中惯用的称呼写道：

“蒋军兄弟：

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，我可能已经与世长辞了。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，你们如果还有点人心的话，请把这

于会泳自杀前后

文/吴明



现代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

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，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。

即使把我的东西拿去也不要紧，但要把我的照片寄给我的母亲留作纪念(照片后写有我家的住址)。”

结果，这张字条被指导员发现并没收了。

12月，胶东战役胜利结束，就在这时，于会泳所写的那张字条，被送到胶东文化协会领导面前。于会泳的字条被认为是对敌人的仁慈幻想，是他未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右倾思想的一次大暴露，也是一种对敌人摇尾乞怜、带有明显变节投降性质的行为。

于会泳从那次受批评之后的表现是好的，文工团和同志们也谅解了他。

1949年6月，胶东文工团决定保送于会泳和另外一名小提琴演奏员到上海学习。但是，尽管如此，他写的那张字条，仍然被留在他的档案袋里，由山东送到上海，这始终成为他难以清除的心病。

肉麻地吹捧江青

1969年1月初，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楼上208室，张春桥、徐景贤、王洪文及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的头头，在拟定参加“九大”的上海代表名单。

深知江青、张春桥垂青于会泳的徐景贤，在整理“九大”代表材料时，隐瞒了于会泳那张小字条的情况，然后上报中央。

“九大”期间，《智》剧作为给代表演出的首场样板戏在京西宾馆礼堂上演。帷幕中间拉开了一条缝隙，于会泳容光焕发地走了出来，一反不善辞令的常态，在他的开场白中肉麻地吹捧江青“……总之，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，为培育样板戏呕心沥血，她实际上是这出戏的第一编剧、第一导演、第一作曲、第一舞美设计！”

江青闻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装腔作势地嗔怪道：“会泳同志，你别这样说了，再这样我可要离场了。”在这公众场合江青对于会泳所表现出来的亲昵，自然使于会泳更为得意。

当“九大”结束，于会泳从北京载誉归来到上海作报告时，一些“造反派”竟设计了一个令人发指的“欢迎仪式”：他们让原校党委书记钟望阳在校门口跪迎于会泳，当于会泳下汽车时，他们又在钟望阳头上搁上“高升”炮仗，然后点燃，以示庆贺。对于这种下流恶作剧，于会泳居然心安理得。

1969年以后一个时期，上

海音乐学院几乎成了人间地狱。反对于会泳，就是反对样板戏，反对江青！由此受迫害、冲击的师生达100多人，先后有3人被逼疯，一度精神失常的有4人，2人被关押入狱。

“十大”筹备期间，中央组织部要调审于会泳的档案。徐景贤断然把那张字条从于会泳的档案中抽掉。于是，在1973年8月“十大”会上，于会泳又顺利地当选为中央委员。1975年1月四届人大会上，他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。

心领神会做“挡箭牌”

1974年底，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故事影片《创业》。江青蛮横地嚷嚷道，“这是部什么东西？片子中的油田党委书记就是‘走资派’余秋里！歌颂他？还有，给石油工人送《矛盾论》、《实践论》的是谁你知道吗？是刘少奇！你们是不是要为他翻案？”最后她又说，“回去后他们文化部先讨论一下，这片子还有什么问题，叫他们赶快修改。你们也要好好检查一下！”

心惊胆战的于会泳，只得起草了一份书面检查，并经文化部核心组讨论，对《创业》作出了“不继续印制拷贝，报纸上不发表评论文章，不出国，电视台电台停止转播”等决定。

然而，仅过了半年，因《创业》作者张天民写信给毛泽东，7月25日毛泽东就《创业》作了重要批示：“此片无大错，建议通过发行。不要求全责备。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，太过分

了，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。”

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没几天，江青和张春桥忙把于会泳叫了去。江青色厉内荏地对于会泳说：“张天民告我的状，说我不让《创业》发行。不让发行是文化部的事，怎么弄到我的头上？对这个片子我是有点意见，但那‘十条’可不是我说的，要说有，只有其中一条是有我的一点内容……”

张春桥也阴笃笃地说：“看来文化部就这事需要向主席作检讨，检讨中牵涉面不要大，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。主席的用字是很严谨的，此片无大错，错还是有的嘛。”



电影《创业》海报

面对毛泽东的批示，江青和张春桥显然在暗示于会泳做“挡箭牌”，对此他是心领神会的。因此，他在硬着头皮给毛泽东的检讨中，将“十条意见”全揽在了自己身上，并在文化部机关传达毛泽东有关《创业》批示时，向公众痛哭流涕地作了沉痛的检查。这时的于会泳在江青面前已成了唯唯诺诺的奴才，而在公众面前，他则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主子。只是，于会泳万万没有想到，1976年10月，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了，他也随之被隔离审查。

被党的政治报告点了名

在被隔离审查的半年多时间里，于会泳在里头写了近17万字的交代材料。1977年8月21日，于会泳获准回家去取一些衣物。对着愁云满面的妻子，他还安慰道：“审查完了后，会给我一个处分，处分大概不会太重，大不了回胶东老家……”

但仅隔一天，华国锋在“十大”会上的政治报告，犹如五雷击顶，将于会泳的侥幸心理无情地打碎了！他想到，自己被党的政治报告点了名，这无疑是政治上的终生判决，这下是彻底完了！

8月28日，于会泳在去屋外散步时，发现了朝向院子的厕所窗边有一瓶来苏水，那是清洁工人用它涮洗完便池的尿碱后遗留在那里的。趁管理人员不注意，他把它挪到了伸手可及的位置上。

晚上6点半钟，在隔壁房间的看管人员见于会泳在写东西，以为他在写材料，并未在意，殊不知他在给家人写遗书。

在这份给母亲、妻子及女儿的遗书中，于会泳写道：

“我跟着‘四人帮’犯了罪，对不起毛主席，对不起党，对不起人民，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，只有一死（后又将‘一死’涂改成了‘长期’——作者注）才能赎罪……”

“我恨透了‘四人帮’，也恨透了自己；消除旧的于会泳！彻底改换……”

8点左右，于会泳将160毫升左右的来苏水，仰头灌入了自己的口中……

（责任编辑 / 亚闻）